

元祐同乞研究



彭国忠 著

元祐词坛 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YUAN YOU
CITAN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祐词坛研究/彭国忠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617-3073-X

I. 元… II. 彭… III. 宋词—文学研究—中国—元祐(1086~1094) IV. I 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633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元祐词坛研究

著 者 彭国忠
责任编辑 钟明奇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5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7-5617-3073-X/I·268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彭君国忠的博士论文《元祐词坛研究》将付梓，问序于余，不能不写上几句话。

近年来，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一个著名论断，屡被学者们称引，可谓耳熟能详，此即《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造极”即前所未有，陈先生未言是否“绝后”，但“空前”之义是确凿无疑的。诚然，汉、唐两代是我国历史上最见开放意识、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但综观文化而言，宋朝的“造极”确实是极其允洽的断语。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在军事上继迫于辽、夏、金、元，却最是“郁郁乎文哉”，其全面的文学成就应高于唐代，更遑论前朝！仅以散文的“唐宋八大家”为例，就有六家在宋，苏氏一门竟得其半。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宋朝至少可以算作白银时代，近人陈衍《石遗室诗话》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此“三元”说是对唐宋诗高峰期的准确概括。由诗而词，由宋词的“一代之文学”的地位，遂引出了本书的论题。

元祐是宋哲宗时的一个年号，仅约9年，而哲宗之时，已非北宋士大夫文人最有作为的真、仁之世，论者之所以重视元祐，是因为作为文化学意义的元祐时期，活动着一批大家、名家：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秦观、张耒、晁补之……大画家李公麟将这些文苑中的著名人物绘入《西园雅集图》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无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辩识、

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姿，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揽者，不独图画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米芾《西园雅集记》）千载之下，尚令人对其文采风流叹慕不已。

或许是出于对此一时期文学的倾心，故当国忠向我征询博士论文选题意见时，我即谓之元祐词坛的研究或可以为之。虽然，作为年号，元祐只是一个较短的时段，因此有必要对此要作适当的延伸，因之我又谈及以文化意义相取之意，并请其思索和论证此说能否成立，以便提供论文的可行基础和坚实前提。国忠不以我说为非，从宋人所论的语境中发见“元祐”的诸多非止于年号意义的涵义，综古今之见，论证了以“元祐”代称北宋后期的合理性，并确定了论证的范畴和理论框架。在征得专家的意见后，开始了论文的写作，经过广泛阅读，搜罗剔抉，深入思考，认真结撰，终于及时完成了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很高评价。在此之后，汲取了答辩时所提的意见，又经过一年多的认真思索和反复修改，由校外专家和学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评审通过，决定资助出版。此前，国忠曾参加过不少集体科研项目，自己也出版过多种书籍，但本书毕竟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因此，我有理由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愚意以为，国忠此书具有不少优点，主要是：

第一，真正从众多的材料出发，通过认真的文本阅读，经过深入的思考，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努力寻找发展的共性和客观的规律性，构建出合理的理论框架，并展开了详明的、令人信服的论述。

此书虽然将元祐作了适度的扩伸，定位为北宋后期，属于不算太长的一个时间段，但此一时期词坛的作者不可谓不多，作品不可谓不丰富，要超越对个案的把握，找到其间的联系和共性，抽绎出可以涵括诸多作者和作品的范畴、概念，实在是并不容易。国忠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全书贯注着以“元祐”始终观照文学现象的精神，而且从文学外部的元祐更化、元祐党争、元祐学术，推而至于整个宋代文化对元祐词坛的影响，到文学内部的词学观念、词学生活、以至于主题、形式等，就这些主要的范畴展开论述，使文学之外与文学之内结合得

非常完备。多视角的广为开掘确实是有意义的,对元祐词坛的分析论证可谓全面而深刻。

第二,在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上把握得很好,本课题的完成可看作提供了对宋代各体文学进行中观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目前,在古代文学的治学中,就个别的作家、作品作无论是传统的或现代意义的微观研究,较为多见,成功者也较多;而宏观的研究也一度被作为号召,当今仍在继续,且有不少成果问世;相对而言,中观层面的研究则显得不够。因此,本书作为分体、分时段的中观研究成果,诚如审稿的一位专家所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很赞成这位专家的意见。这十多年来虽然可以看到不少中观研究的力作(如南京的唐门和程门弟子已出版的多种博士论文都属于此列),但即使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唐宋文学,也还有不少可以做的中观研究有待进行。今天,我们终于欣喜地看到了彭国忠的这一本书,即使不敢说是填补空白,至少可以说是为北宋后期词坛群体研究提供了新成果。以前,人们常说“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或许是因为宏观的研究偏在“森林”,而微观的研究则偏在“树木”,中观的研究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是自有其理的。

第三,在避免过度的主观化或过于深求、过多的客观描述而概括提炼不够的同时,能较好地把握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对有些问题提出己见,有发覆之功。

衡量如今的学术研究,对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之把握,似乎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我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人们观照历史,却往往看到了无序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对历史作客观描述的同时,努力探讨其发展规律,而这种探讨又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尽量接近客观规律本身,确实是很难办到的。如果做得比较完美,我们就可以说是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了,反之则难以用此标准评判。国忠在此书中,对元祐时期的“更化”、党争、学术等历史、文化现象都有很准确的描述,为阐释元祐词坛的生成机制和深层意蕴打下了“历史”的基础;而诸如元祐学术的反对王安石“新经义”一统

天下,所引起的文学创作个性的焕发,使元祐词坛有多样风格出现,词人以词共同反映在党争中的真实心态,使政治抒情词获得了“言志”功能,提高了词在文学中的地位,学术精神对词的议论化和人文旨趣的影响等等,则为元祐词发生、发展揭示出其中的规律,此即“逻辑”。在此书中,历史的描述与逻辑的揭示结合得较为完美,没有截然分开的现象。

近年来,许多青年学者由于对理论的重视,所写著作多能体现出这方面的修养,但与此同时,也会有运用某些理论解决问题而出现的“过度阐释”之弊,使“逻辑”凌驾于“历史”之上,游离于“历史”之外。观国忠此书,则全然没有此类不足。如论述宋代文化对元祐词的诸般影响,举凡党争所造成的“诗祸”使多数词人产生避祸心理从而将一些情志由诗转入词,使词获得“言志”功能;元祐词家以悼亡、寄内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净化”了男女之情,从传统婉约词的核心阵地进行改革,其功不亚于苏轼豪放词的开疆拓土等,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其中对著名的《花间集序》的重新阐释,更是言人所未言,确有发覆之功,曾得到参加答辩的学者的高度评价;对“以诗为词”的论述,也堪称“前修未逮,后出转精”。

国忠所著,并非无懈可击、十分完美。在作为博士论文答辩时,对柳永词的评价与苏轼对其之态度,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的关系等问题,都引起了答辩委员的不同看法;甚至认为所写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苏轼打破了柳永的一统天下,却造成了苏轼的一统天下。但国忠能虚心听取意见,认真修改,使之不断完善,终能以今天的面貌出版。相信此书梓行之后,读者也许会从中发现某些不足,或会有商榷之见;但同时也相信,凡是研究北宋后期词的学者,都不可能绕开此书而无视它的存在。

国忠皖人,从安徽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师从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宛敏灏、刘学锴、余恕诚三位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得到悉心指导,尤其在唐宋文学方面打下了很深厚的基础。毕业以后,留在校图书馆工作7年,曾担任古籍部主任,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充分利用

藏书居全国师范大学图书馆第三位的优势,在与古人精神晤谈同时,大量涉猎馆藏典籍,在文献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期间,为参编《中华文艺大辞典》撰写的84位作家小传,为《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撰写的近700条条目,校点的《张孝祥诗文集》等,都获好评。此后,在参撰《豪放词》、《明清词》、《豪放词萃》、《绝妙好词译注》、《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等书中,都可以看见他的文献学与文艺学功底。我就是在8年前约写《全宋词评注》稿而为寻找作者犯愁时,得人介绍而知道彭国忠的,后来收到他写来的稿子,果然见出了与其年龄不甚相称的老练、成熟,很惊异于他对诸多事典的了解和阐释之完备。不久我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并招收了第一届学生,知道他是硕士毕业,遂试探性地征询是否有意于进一步深造,在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我很盼望他能成为我的第二届博士生。他终于在经过认真的备考,尤其是在重新捡起英语、备尝艰辛后,在1997年成为我的博士生。平心而论,我对于他学业的指导,是无法与他在安徽师大所受到的严格训练相比的,只不过是,我更为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使他开始了从重在文献学到兼顾文艺学、文化学的学术转型,在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同时,他参与了诸种书籍的编撰,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考证、释疑、辨订、笺注等传统学术之长以外,又表现出论述、阐释的诸多长处,其中的一些论文(如《大晟词派质疑》、《论宋代〈调笑〉词》等)已引起学界瞩目。

国忠为人诚挚忠厚,谦虚好学,在探讨学问中,常令人有起予之叹。只是,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不善于自我“包装”、不注重“功夫在诗外”,不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置于人与文的关系之上,只是孜孜矻矻,一心向学,常常是不够的。我也曾希望他不要像我这样落伍,而他只是尴尬地、憨厚地笑笑,算是对我“歪教邪导”的回答。其实,我又何尝不知“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望国忠的不要似我亦非由衷之言。从内心来说,我是很希望他能保持这份真诚、忠直,不要为世风所变,而要努力改变世风。欧阳修曾对苏轼说过:“我所谓文,必有道俱,见利而迁,则非

我徒。”我与国忠，当然不敢以欧苏相拟，但欧公所言，却是我所不能忘的。国忠既以“文”为业，虽目前还不免要为“在沪居，大不易”而犯愁，但正如流行语所说，是“痛并快乐着”，想必也会秉此教导而受用终生的。

由文而人，不免写得离题了。国忠介于而立与不惑之间，正是治学的最佳年龄，相信此书出后，定将一发而不可收，会在学问上有不断的创获。回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风雨雨中走过的，是在战天斗地、务农学军的汗水灰尘中度过的，后来到了西北、与顽童打了多年交道，仅是混饭而已，焉论治学！在左倾思潮的淫威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岂能梦见！我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晚，对青年学人们是很羡慕的，今天，如国忠他们，也许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他们的生活、治学环境无疑要远远好于我们当年。因此，我也常常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所说的那段话，确实，我也衷心希望下一代与自己这一代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展望未来时，我相信，国忠以及他们这一辈的学术新生代，一定会取得前人不能取得的成绩。

诗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明天是美好的，我坚信！

意有所感，顺笔为之，拉杂无次，国忠其能宥乎？

是为序。

邓乔彬

2002年7月4日

于沪上之五桂斋

前 言

苏轼时代的词坛，与前代相比，有两种新的情况在词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大书特书。其一是苏轼的词体革新及其所引起的词坛的变化。正如胡寅在为向子湮《酒边词》作的序中所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苏轼对词坛的革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可以比拟为词学中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二，则是优秀作家联袂登场，同坛“献艺”，形成宋代词史上第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也是宋词创作的一大高峰时期。对这两种“新的情况”，应该说，词学界都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充分的肯定，然而，同时也存在着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将前者仅仅理解为豪放词对婉约词的冲击，一是将苏轼个人的创作与整个词坛的繁荣分别对待，而无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第一个不足之处，翻开苏轼的集子即可发现，他真正可以称得上豪放的词作，数量并不太多，而且，他创作豪放词的时间也不长，在元祐以后，他就很少再有豪放词问世了。当然，苏轼对词坛的革新以豪放词最为直接，最为有力，但这不等于说他的贡献只在豪放词。

关于第二个不足之处，我们认为，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离开时代的气候和土壤，一切都将从无从谈起；被后人奉为天才的大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必然打上时代的印痕。苏轼自不例外。在他同时代人的词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有许多这样那样的词学因素与他的作品相似或相同。这说明，苏轼不是什么“横空出世”，也不是“天马行空”，他也生活在具体的人群中，生活在特定的时代

中；苏轼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因为时代印痕在他的词中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鲜明。而要完整地、全面地了解苏轼，就不可不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①反过来说，一个作家或一件艺术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其背后有着“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作为必然的“统治者”行使决定权，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但同样沾承这个“精神”和“概况”的作用，他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最终也汇成为“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的一股力量。令人不解的是，长期以来，对苏轼及其同时代作家的研究，总是孤立进行的，人们强调的是词人之间的“异”，而忽略他们之间的“同”，从而也就看不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将苏轼作为一个普通的词人还给他那个特定的时代，让他回归到当时的人群中，然后，通过研究，指出他与其他词人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再从人流中指认出他，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动机和初衷。而这样所得到的词人苏轼，恐怕比以前的苏轼要来得更加真实，我们对苏轼的认识，也要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更符合词史上的苏轼。遗憾的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原因，这个初衷只能实现一半，也就是说，这里进行的只是让苏轼回归他的时代，却没能将他指认出来，这样，东坡先生的形象无疑降低成了一个普通的词人。不过，好在他的地位，词史上早有定论，相信不会因为这本小书而有丝毫的损害。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与苏轼同时代的一群词人时，不禁惊异地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片灿烂耀眼的星空：作为核心的，自是苏轼，围绕着他的，则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

①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以及与四学士合称为“苏门六君子”的陈师道、李廌；苏门的外围，有李之仪、毛滂、贺铸、赵令畤、王诜、释仲殊、张舜民，与苏门词人向有交往的，还有范祖禹、孔平仲、郭祥正、晁端礼^①、晁冲之、王齐叟，而王安石、舒亶却是苏轼的政敌。此外，尚有大词人晏几道，他的年岁与苏轼差不多^②，同黄庭坚多有文字酬赠，但与苏轼及其他词人无来往^③，可谓“独”行于世；至于周邦彦，其父辈同苏门有交谊，当元祐时，他尚未怎样在词坛露头角，将他置于下一个词学阶段似乎更为合理。这些词人，行辈不尽相同，创作词的时间或早或迟，但他们大致与苏轼相前后，共同促进了词坛的繁荣，这一点，当无疑问。他们的词作品，也就成为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

自然，既不以词人为纲，也就不会以他们与苏轼或苏门的关系的亲疏为参照系。本书选择的则是“分而合之”的研究方法，即：不对单个词人作全面研究，而是在通读他们的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将他们词创作中的一些现象，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因子”，再找出其他几个或更多词人的类似或相同的“因子”，将这些“因子”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或词学现象看待，通过对这些“新”现象的考察，进一步描述元祐词坛的总体面貌，揭示元祐词的特质及其成因。这种方法实质上与西方人所说的“文学类型法”接近，其宗旨是“以新的目光审视已经熟知的作品”，并“重新发现一些作品”，或者“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作家”，以揭示“一个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群体”在基本主题和形

① 晁端礼(1046—1113年)向被当作大晟词人，但考其生卒年，与黄庭坚相仿佛，故列于此段。

② 对于晏几道的生卒年，有夏承焘先生《二晏年谱》、宛敏灏先生《二晏年谱》、柏寒先生《二晏行年简谱》、郑寿先生《二晏年谱补正》、《晏叔原年谱新考》等著作加以考证，而诸家之说略有出入。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夏先生的公元1030—1106年说。但据涂木水先生所得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晏殊二十九世孙、江西湖口县令晏成玉主修《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之“临川沙河世系”载，晏几道“宋宝元戊寅四月二十三日辰时生，宋大观庚寅九月歿，寿七十三岁，”即公元1038生，1110年卒，这与苏轼生卒年(1037—1101年)恰相上下。涂文《关于晏几道的生卒年和排行》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③ 元代陆友《研北杂志》引邵伯温之子博(字泽民)话云：“元祐间，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黄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

式方面的相似性^①。这样做的代价,是势必因此而冷落另外一些作家和作品,特别是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和作品,可能得不到优先注意,从而甚至给人“元祐词坛不过如此”的相反印象,所以,这种方法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它可能带来的预期效果似乎诱惑更大,使我们愿意冒险一试。比如,苏轼、贺铸二家的悼亡词,向被各自独立研究或欣赏,如果我们采用“作品群体”这种特殊的眼光加以考察,则可以把它们与其他词人有关描写自己妻子的词作联系起来,得出元祐词中出现“新”女性这个新的看法。又比如,苏轼的创作,在当时曾有“以诗为词”之评,其贬意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联系后人对元祐时期其他词人的评论,则发现,所谓“以诗为词”,是元祐词坛一大根本特征,不论当时的词家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还是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论这个评语究竟是褒扬还是贬低,元祐词家共同性的“以诗为词”都是一个客观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深入研究,我们又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发现。

本书之所以不以“苏门”命题,是出于以下两个认识:其一,如前文所提到的,这段时期的词作者,除了苏门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词人外,尚有一些其他词家,非“苏门”所能涵纳;其二,“‘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松散的文人群体”,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或文人社团的性质;它又是一个“政治上自立自断、学术思想上独立思考、文学艺术上自由创造的一个集合体”^②,其“同”不足以概括元祐词坛之“同”,其“异”也不足以概括元祐词风之异,故为本书命题所不取焉。

至此,我们不得不论证本论题的合理性,并对题中“元祐”一词的时间作一界定。作为历史年号,“元祐”指的是北宋哲宗皇帝当政的一段时间(公元1086—1094),其历史长度约为9年。但它往往被赋

① [法]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101—10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② 王水照:《“苏门”的性质和特征》,见其所著《苏轼研究》一书,4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予文化上的某些涵义，因而，它的长度也获得相应的拓伸。本书即取其文化上的广伸义。这里不妨且先看宋人所使用的相关语词：

“元祐”：

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

朱熹《题荆公贴》

“元祐诸老”：

元祐诸老爱君之心切，正人伦于夫妇之始。当时曲台议礼，则此四君子在焉。乌乎盛哉。

张孝祥《题龚深之侍郎太常奏稿后》

“元祐诸公”：

始侍郎公及与元祐诸公游，嘉言懿行，太夫人悉能记之。

张孝祥《高侍郎夫人墓志铭》

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

汤衡《张紫微雅词序》

“元祐人”：

已而北人不及之，忽问曰：“南朝（按：指宋）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

子由自岭外归许下，号颍滨遗老，家有遗老斋。盖元祐人至子由，存者无几矣。

叶梦得《石林燕语》

“元祐学者”：

蔡元长……宣和间，使其子招致元祐学者，又使其门下客著《西清诗话》，载苏、黄语，亦欲为他日张本耳。

吴曾《能改斋漫录》

在这些语例中，“元祐”或者已非年号之义，或者不仅仅指年号，如朱熹所用的“元祐”实指元祐诸公或苏、黄等大家，而“元祐诸老”、“元祐诸公”、“元祐学者”中的“元祐”虽是指年号，各语称均指元祐年间擅名的诸人，但是，一旦与表示人的词语连用，其“年号”之义便隐淡不彰了，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时间显非元祐9年所能框囿，尤其是“元祐人”一语，若拘泥于字面之义，那是断难理会的。与其把它当作历史年号，不如作为文化（文学）范畴使用更切合实际情况。

其实，中国文学一直有着以年号标识文学现象、文学风格的传统。著名的如建安骨或建安风骨。李白《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蓬莱文章建安骨”，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指的都是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人的诗文所具有的慷慨悲壮、刚健遒劲的风格。就时间论，其中的“建安”也要长于其本来所有的25年（196—220）的历史长度。今人蒋寅先生论大历（766—779）诗风，亦将讨论的上限确定在天宝十四载（755），下限定在贞元八年（792），前后迤邐近40年^①。在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的16种“诗体”中，就有以年号命名的9种，它们是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

① 蒋寅：《大历诗风》，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体等,黄初只有7年(220—226),比元祐还短。而“元祐体”并列其中,严氏自注云:“苏、黄、陈诸公”,显然是以元祐时期苏、黄、陈诸公为元祐体的主体,倘若有人据以研究“元祐体”,必将与研究“元祐诗坛”没有太大的不同。

赋予“元祐”以文学意义者,不止严羽一人。“苕溪渔隐曰:元祐文章,世称苏、黄”^①,这里的“文章”最低限度也包括诗与文在内,可见,元祐文坛仍然以苏黄诸人为主体的。近代陈衍在其《石遗室诗话》(卷一)中曾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总按部分,他在对宋诗作阶段划分时又说:“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结合他的这两段话,可以肯定,他心中的“下元元祐”显然包括从元丰迄北宋之末一整段时间,其长度要比本书所涉还长,足以支持我们以“元祐”代称北宋末期苏、黄、秦、晁、陈等诸人活动于其中的时间段的用法。

今人实际也持这个观点。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编第四章第三节《苏轼的诗》云:“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即以“元祐”代指北宋后期诗坛,又以王、苏、黄、陈诸人为元祐创作主体;而在自注中,该书于引用石遗老人“三元”说之后,亦明确解释:“所谓‘元祐’,指王、苏、黄、陈等人活跃于诗坛的北宋后期。”^②

上文旨在申说以“元祐”代称北宋后期诗坛的合理性,所引诸家之说自是言诗,并非论词。那么,一旦将话题转移到词坛,论题能否成立?我们认为,词坛上的“元祐”说同样可以成立。理由有三。其一,只要打开《全宋词》即可发现,整个北宋词坛,除了前面的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后面的周邦彦数家外,其他的大家、名家就都集中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

②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76页、8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于后期这一段时间内了；而同文坛、诗坛的情况一样，苏轼及其门下的黄、秦、晁、陈，还有与苏门过往甚密的贺、毛等人，皆可谓一时之选。吴梅先生《词学通论》于北宋词人取8家，元祐词家苏、贺、秦居其三；附录13家，王安石、晏几道、李之仪、黄庭坚、张耒、陈师道、毛滂、晁补之、晁端礼9家在焉。故以“元祐”代北宋后期词坛，应该没有疑问。其二，在后期这些年代（号）中，元祐以前，如苏、秦等人虽有词名，但多数词人立足未深^①；元祐以后，不但三五年一更年号，而且，政局动荡，词人遭遇不偶，迁谪飘零，先后殒世（政和四年，苏门最后一位词人张耒去世，晁端礼、郑仅、舒亶、米芾、谢逸亦先下世，元祐词家只剩下贺铸、毛滂、赵令畤几人），实不具更充足的代表性。其三，以“元祐”概括北宋后期词坛，另有其他深远意义。盖“元祐更化”于后期历史链中是孤独的一环，而其对词坛之造就者，功莫大焉；元祐党争最为复杂，其对词人命运遭际、词的内容风格的影响亦甚巨大；“元祐学术”最负时名，其对词学精神的形成也最为直接。而元祐年间，苏门的形成和聚会于京师，首次以群体的姿态显示了词学的力量和生命，震撼了社会，也改变了相当一部分人卑视词的心理，并留下一个“词学盛世”的不朽形象于后人心中，使“元祐诸公”、“元祐诸贤”成为谈艺家津津不疲的话题，此亦见出“元祐”于词坛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概括而言，本书所谓“元祐词坛”，系因沿宋人的用法，并参考今人的说法，指以元祐诸大家为主体、以他们的词学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词坛。从理论上说，它应以元祐所有词人的自然生命和词学生命为时间段落，其长度约相当于北宋的全后期，但是，如前所述，这段时间内，词家辈出，名作林立，是宋词的繁荣期，也是近年来词学界研究的热点，其涵量之丰富绝非本书所能载负；而关于苏轼及其门人，也几

①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云：“有宋熙、丰间，词学极盛。”认为宋词之盛在熙宁、元丰间，所举词人亦苏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数家，自有一定道理，但以诸人行实考之，似略提前了一些。